

## 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研究：来自 CTUS 的经验分析

韩 中 王 刚\*

---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系统研究了中国家庭家务劳动代际分工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父辈与子辈的家务劳动时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母亲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年龄和主要活动状态对子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较为显著,年龄越小或以“在校学生”、“全职工作”为主要活动状态的子女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更少;父母工作状态显著影响自身及其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工作时间越长,其家务劳动时间越少而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相应增加;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父母的家务劳动分工相对公平,具体表现为母亲家务劳动时间减少而父亲日常家务劳动增加,但父母性别平等观念对子女家务劳动分工的“代际传递”效应并不显著。

**关键词** 家务劳动 代际分工 时间利用 性别观念

---

### 一 引言

家务劳动分工一直是社会和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家庭问题。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存在于社会公共领域和家庭私人领域,认为男性在市场性劳动就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女性则在从事家务劳动方面有“比较优势”,从而普遍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女性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经济自主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市场劳动工作,女性就业率显著增加。

---

\* 韩中,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hzhong1984@126.com;王刚(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moxuyuw@163.com。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居民时间分配的统计研究及其国际比较”(17CTJ018)的资助。

至 2017 年末，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3.5%<sup>①</sup>。然而，女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转变和地位提升并未同步体现在家务劳动分工中。虽然家务劳动性别差异有所减小，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女性“第二轮班”现象较为普遍，既要从事市场性就业活动以降低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同时也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以维持家庭的日常运行，从而导致其在教育、休闲和社会交往等活动的时间投入相对较少，严重影响了女性的个人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Fuwa, 2004; Fuwa & Cohen, 2007; Lincoln, 2008; Mannino & Deutsch, 2007; Pinto & Coltrane, 2009; Poeschl, 2008; 杨菊华, 2014）。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将促进男女平等和女性全面发展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擘画，继续加强“男女平等”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贯彻和实施。

性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显著（Bianchi & Milkie, 2010; 刘爱玉等, 2015）。虽然近年来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率有所提高，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Claffey & Mickelson, 2009; Greenstein, 2009; Hook, 2006; 佟新、刘爱玉, 2015）。除性别因素外，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个人变量及家庭规模等家庭变量也是影响家务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目前，解释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的主要理论是相对资源理论、时间禀赋理论和性别观念理论。

相对资源理论（或经济交换假说）认为收入、学历等外部资源赋予个人一定的决策权力（Mannino & Deutsch, 2007），在家庭事务中，个人对家庭经济的相对贡献越大，其在家务劳动分工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越强（Pinto & Coltrane, 2009; 齐良书, 2005; 孙晓冬, 2018; 贺光烨等, 2018），从而从事较少的家务劳动（Bianchi et al., 2000; Parkman, 2004; Kundsén & Wærness, 2008）。相对资源理论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家务劳动对个人而言意味着精力和时间的投入，具有负效用，个体主观上希望“逃避”家务劳动工作。时间禀赋理论认为个人家务劳动时间不仅受家务劳动“需求侧”的影响，同时也面临家务劳动“供给侧”的制约，即个人能否自由支配并投入相应的时间来从事家务劳动（Davis et al., 2007）。家务劳动的时间禀赋约束主要和个人的市场工作状态及时间密切相关，相比于没有工作的个体，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的个体时间资源约束更强，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少（Artis & Pavalko, 2003; Gershuny & Sullivan, 2003; Ciabattari, 2004; Hook, 2006; Nooman et al., 2007）。个人工作状态及时间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会对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尤其是妻子

① 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统计监测报告。

的工作状态对丈夫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当妻子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时，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增加（Kroska, 2004; Cunningham, 2007; Robinson & Hunter, 2008）。性别观念理论强调个人所持有的观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平衡。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个人认为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都应相互平等，在家务劳动分工中也应体现这一原则，夫妻双方应该共同承担家务劳动，而传统性别观念则认为女性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个人性别观念越是趋向于现代、平等，家务劳动时间越少，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鸿沟”显著缩小，且性别观念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改变更为显著（卿石松, 2017）。与传统性别观念相比，若夫妻双方或一方持有性别平等观念，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将显著减少，其家务负担会明显改善（Arrighi & Maume, 2000; Parkman, 2004; Davis et al., 2007）。

相对资源、时间禀赋和性别角色理论为解释家务劳动分工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居民时间利用数据，从不同的视角对家庭成员家务劳动时间差异进行分析和解释。大量研究表明，随着女性就业率增加，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性别观念愈发趋于平等，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减少，而男性则明显增加，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尽管如此，从家务劳动分工来看，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现有文献主要以成年已婚父母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夫妻双方家务劳动时间差异及其影响机制。也有研究发现家庭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务劳动分工同样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Evertsson, 2006; Coltrane, 2000; Miller, 2012），女性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高于男性。但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家务劳动在父母及其同住未婚子女间的代际分工（Mitchell, 2004; Craig, 2015）。中国未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子女通常也会协助父母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有时子女（尤其是女儿）对家务劳动的贡献甚至高于父亲。已有研究从性别、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家庭规模等家庭因素对父母家务劳动时间及其差异进行分析和解释。那么，子女家务劳动时间是否同样受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双重影响？此外，父母与子女的个人因素是否也是影响彼此家务劳动时间的重要变量？如父母的工作状态是否会影响子女的家务劳动时间？父母的性别观念是否存在“代际传递”，从而影响子女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模式？同样，子女的性别、年龄和主要活动状态（在校学生、全职工作等）是否也会影响父母的家务劳动时间？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利用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China Time Use Survey, CTUS）数据来系统研究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问题。从调查对象来看，不同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时间利用调查，CTUS对被抽中家庭中15~74岁居民全部进行了调查，而不

是仅调查家庭中一位居民；从调查内容来看，CTUS 同时包含父母和子女的个人信息及其工作日、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这为本文开展中国家务劳动代际分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家务劳动的特点，本文依据其是否为“时间密集型”及发生的频率，将家务劳动分为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分别研究父母及其子女不同类别家务劳动时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并实证分析父辈与子辈家务劳动时间的代际效应。

## 二 数据来源、变量解释与研究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8 年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CTUS）。CTUS 是国家统计局在北京、河北等 10 省市首次开展的全国性居民时间利用调查，从时间利用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国民的生活模式和生活质量。CTUS 以抽中调查户中 15~74 岁人口为调查对象，调查户为 10 省市现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网点的全部城镇国家样本和抽取的部分农村国家样本，总计调查了 16661 个家庭户，共 37142 人。

CTUS 采用国际通用的时间调查日志表，以每十分钟间隔为一段系统记录了被调查户中所有 15~74 岁居民在休息日和工作日一天（24 小时）所从事的各类活动。日志表不仅详细记录了居民每一时间段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及其所花费的个人时间，也提供了主要活动的“活动地点”、“交通方式”以及“主要活动开始时与谁在一起”等相关信息。此外，日志表还记录了居民在从事主要活动的同时所进行的其他活动（次要活动）。

为了保证调查具有国际可比性且能准确反映中国的基本国情，CTUS 参照联合国和欧盟统计局的活动分类标准，将居民每天从事的各种活动分为九大类：个人活动；就业活动；家庭初级生产经营活动；家庭制造与建筑活动；家庭服务经营活动；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提供的无酬家务劳动；照顾家人和对外提供帮助；学习培训；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本文以“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提供的无酬家务劳动”（下文简称“家务劳动”）为研究对象。

依据 CTUS 时间利用统计的活动分类，“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提供的无酬家务劳动”主要包括：准备食物、饮料及相关的清理活动；住所及周边环境的清洁整理；洗衣、整理衣物；购买商品与服务；饲养宠物；自己动手进行的小规模装修、维护和修理；家庭事务的安排与管理。根据家务劳动发生的频次及其时间弹性，本文将家务劳

动分为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日常家务劳动是指几乎每天必须从事的活动,发生的频率较高且时间弹性较小,对居民的时间约束较为明显;相比之下,非日常家务劳动发生的频次较低且时间弹性较大,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时间从事该类活动,其对居民的时间约束相对较弱。结合 CTUS 家务劳动分类,在本文研究中,日常家务劳动包括准备食物、饮料及相关的清理活动,洗衣、整理衣物,以及购买商品与服务。其他家务劳动则纳入非日常家务劳动。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家庭中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对于家务劳动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分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虽然夫妻双方(尤其是妻子)通常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其子女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与贡献不容忽视。研究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及其影响机制不仅需要掌握夫妻双方的个人变量以及分配于各类家务劳动的个人时间,同时也需要搜集子女的上述信息。至今,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已经开展了居民时间利用调查,但其仅对被抽中调查户中一位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进行调查,无法满足家务劳动代际分析的需要。CTUS 则对被抽中调查户的所有居民均进行了调查,所搜集的夫妻双方及其子女的时间利用数据能够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参照 Craig (2015) 的研究方法,本文重点研究夫妻双方及其 15~34 岁未婚子女之间的家务劳动分工。为了避免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样本户家庭成员只包括夫妻双方及子女,最终样本为 2430 户,其中儿子 1378 人,女儿 1052 人。

## (二) 变量解释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重点研究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从时间利用的视角分析家务劳动在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分工。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家务劳动时间、日常家务劳动时间以及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

为了考察不同辈分、不同性别家庭成员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差异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分别测算出父母及其子女花费于家务劳动(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的时间,并按辈分、性别分别进行了定量分析。其中,家务劳动时间、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反映家庭成员一周平均每天所花费的时间,是通过对个体休息日(权重为 2/7)和工作日(权重为 5/7)相应家务劳动时间加权所得。

### 2. 解释变量

在家务劳动代际分工的研究框架下,父母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既包括性别、工作状态等个人变量以及家中有无 0~6 岁小孩、城乡性质等家庭变量,同时还包括子女年龄、主要活动等子女变量。同样,子女家务劳动时间影响因素既包括个人变量、

家庭变量，也包括父母变量。

其一是子女变量。性别：性别差异是家务劳动分工的最显著特征，现有研究普遍发现夫妻双方家务劳动分工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妻子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那么子女家务劳动分工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性别差异呢？为此，本文按性别将子女分为男性（儿子）和女性（女儿）。年龄：本文研究对象为15~34岁未婚子女，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子女主要从事的活动不同，年龄较小的子女以在校学生为主，而年龄较大的子女则以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为主，其从事家务劳动所面临的时间约束程度不同。此外，年龄较大的子女在从事家务劳动的能力和经历上均有着比较显著的优势，更倾向于承担相对较多的家务劳动。为考察年龄对子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本文将子女按年龄分为15~19岁、20~24岁和25~34岁三个年龄组。主要活动：子女目前的主要活动是影响其家务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相比于在校学生或从事全职工作的子女，兼职或没有工作子女的时间约束较弱且时间弹性更大。为此，本文将子女按目前主要活动分为在校学生、全职工作、兼职工作和没有工作四类。

其二是父母变量。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反映了一个人的工作时间约束，从而影响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资源禀赋，本文将父母工作状态分为全职工作、兼职工作和没有工作。为构造工作状态变量，本文首先通过对父母工作日和休息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内生产活动时间进行加总得到其每周工作时间，若每周工作时间大于35小时，工作状态为全职工作，若工作时间小于等于1小时，工作状态为没有工作，其他情形则为兼职工作。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夫妻双方的相对资源禀赋，从而影响其家庭事务决策权力，同时教育程度高低能够反映个体的性别观念及其代际传递，并在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中予以体现。CTUS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中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中等教育包括高中（中专中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其三是家庭变量。家中有无0~6岁小孩：子女的年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务劳动的需求，子女年龄越小，越需要父母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照料，意味着更长的家务劳动时间。由于CTUS并未对家庭中15岁以下子女的个人信息及时间利用数据进行调查，无法准确获得15岁以下子女的年龄及数目，但利用日志表中“主要活动开始时与谁在一起”信息栏可以确定该家庭中是否有0~6岁小孩，于是，本文构造了“家中有无0~6岁小孩”这一虚拟变量来反映学龄前儿童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能够影响家务劳动的市场供给，经济社会发展越好往往意味着家

务劳动市场化程度越高,可以通过市场供给方式来满足家务劳动需求,从而减少家庭成员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和地区差异,本文将家庭所在地分为城市和农村,并依据家庭所在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了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知,研究样本户中子女的年龄以15~19岁为主,约一半子女属于这一年龄段,20~24岁、25~34岁年龄组的子女所占比例分别为31.6%、19.92%。从主要活动状态来看,子女以在校学生和全职工作为主,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9.05%和36.67%。父亲的工作状态以全职工作为主,被调查的父亲中约3/4从事全职工作,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母亲(53.7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父母在接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母亲,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20.91%和14.36%。此外,13%的样本户中有0~6岁学龄前儿童。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子女特征				
性别				
男 <sup>a</sup>	0	1	56.00%	0.50
女	0	1	44.00%	0.50
活动状态				
在校学生	0	1	49.05%	0.50
全职工作	0	1	36.67%	0.48
兼职工作	0	1	6.91%	0.25
没有工作 <sup>a</sup>	0	1	7.37%	0.26
年龄				
15~19岁 <sup>a</sup>	0	1	48.48%	0.50
20~24岁	0	1	31.60%	0.47
25~34岁	0	1	19.92%	0.40
父亲特征				
工作状态				
全职工作	0	1	74.36%	0.44

续表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兼职工作	0	1	14.40%	0.35
没有工作 <sup>a</sup>	0	1	11.23%	0.32
受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	0	1	20.91%	0.41
中等教育	0	1	68.40%	0.47
初等教育 <sup>a</sup>	0	1	10.70%	0.31
母亲特征				
工作状态				
全职工作	0	1	53.79%	0.50
兼职工作	0	1	21.28%	0.41
没有工作 <sup>a</sup>	0	1	24.94%	0.43
受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	0	1	14.36%	0.35
中等教育	0	1	65.84%	0.47
初等教育 <sup>a</sup>	0	1	19.79%	0.40
家庭特征				
家中有无0~6岁小孩				
有	0	1	13.00%	0.33
无 <sup>a</sup>	0	1	87.00%	0.33
城乡				
城市	0	1	61.00%	0.48
农村 <sup>a</sup>	0	1	39.00%	0.48
区域				
东部地区	0	1	48.68%	0.50
中部地区	0	1	30.37%	0.46
西部地区 <sup>a</sup>	0	1	20.95%	0.41

注：a 均为后文回归分析中的对照组。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重点研究“双亲家庭”家务劳动在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分工，分性别研究父母及子女家务劳动时间、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考虑到样本中许多家庭成员并未从事任何家务劳动，其家务劳动时间为0，即研究所涉及的被解释变量为删截变量，且删截的阈值为0，故本文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t_{ijk}^* = x'_{ij} \beta_{jk,f} + x'_{im} \beta_{jk,m} + x'_{ic} \beta_{jk,c} + x'_{ih} \beta_{jk,h} + \varepsilon_{ijk} \quad (1)$$

(若  $t_{ijk}^* > 0$ ,  $t_{ijk} = t_{ijk}^*$ , 否则  $t_{ijk} = 0$ )

其中,  $t_{ijk}^*$  为潜在变量, 表示父母或子女从事各类家务劳动的能力和意愿,  $t_{ijk}$  是实际观测值, 表示其实际家务劳动时间, 潜在变量只有在超过阈值 0 时才能被观测。i 指父母和子女所在样本户, j 代表家务劳动、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 f、m、c 分别表示父亲、母亲和子女,  $x_{ij}$  和  $x_{im}$  代表父母变量,  $x_{ic}$  和  $x_{ih}$  分别表示子女变量和家庭变量,  $\varepsilon_{ijk}$  表示独立且服从于正态分布的误差项。

###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家务劳动代际分工的性别差异

表 2 结果表明, 无论是父辈还是子辈, 其家务劳动参与率及平均时间均存在着统计显著的性别差异。样本户中几乎所有母亲都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 其家务劳动参与率高达 98.44%, 高出父亲参与率近 20 个百分点。从家务劳动时间来看, 父母每天家务劳动平均时间分别为 67.7 分钟和 206.31 分钟, 母亲家务劳动平均时间是父亲的 3 倍多, 每天比父亲要多花费 138.61 分钟来从事家务劳动。可见, 父母在家务劳动分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这与母亲是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这一现实相吻合。

相比之下, 子女在家务劳动参与和时间投入上均低于父母, 其家务劳动参与率分别仅为 51.45% 和 70.91%, 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 23.26 分钟和 51.37 分钟, 分别约为同性别长辈家务劳动时间的 1/3 和 1/4。在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上, 子女同样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儿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 其家务劳动参与率比儿子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 在时间投入上, 女儿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比儿子多出 28.11 分钟, 是儿子家务劳动时间的 2 倍多。从家务劳动家庭成员分工来看, 父母(尤其是母亲)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其承担了家中约 90% 的家务劳动, 其中父母从事的家务劳动比例分别为 22% 和 67%, 而子女从事的家务劳动仅占 10% 左右。

从家务劳动性别差异来源来看, 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 其家务劳动性别差异主要来源于日常家务劳动, 虽然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但其时间绝对差异较小。父母和子女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中约 87.6% 来源于日常家务劳动, 日常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分别为 121.39 分钟和 24.60 分钟, 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则分别为 17.04 分钟和 2.72 分钟。

表 2 代际家庭成员家务劳动的参与率、均值及性别差异

家务劳动	父亲		母亲		均值 差异	儿子		女儿		均值 差异
	参与率 (%)	均值 (分钟)	参与率 (%)	均值 (分钟)		参与率 (%)	均值 (分钟)	参与率 (%)	均值 (分钟)	
家务劳动	79.26	67.70	98.44	206.31	-138.61***	51.45	23.26	70.91	51.37	-28.11***
日常家务劳动	72.35	51.76	98.23	173.15	-121.39***	44.34	18.29	65.30	42.89	-24.60***
非日常家务劳动	35.68	14.31	70.86	31.35	-17.04***	17.13	4.58	28.99	7.30	-2.72***
样本数	2430		2430		—	1378		1052		—

注：\*\*\* 代表在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 (二) 不同年龄子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

子女在不同年龄段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明显不同，年龄较小的子女主要以在校学生为主，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子女参与市场劳动，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由表 3 可知，15~19 岁子女主要以在校学生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 82.55% 和 82.65%。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从事市场性全职或兼职工作的比例显著提升，20~24 岁、25~34 岁儿子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分别为 55.68% 和 75.34%，远高于 15~19 岁的 11.99%，同样，女儿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也从 15~19 岁的 10.26% 增加至 20~24 岁的 50.61% 和 25~34 岁的 66.49%。

表 3 不同年龄段子女的主要活动

单位：%

主要活动	儿子			女儿		
	15~19 岁	20~24 岁	25~34 岁	15~19 岁	20~24 岁	25~34 岁
在校学生	82.55	23.64	3.04	82.65	29.57	4.79
全职工作	11.99	55.68	75.34	10.26	50.61	66.49
兼职工作	2.34	11.36	11.15	2.99	9.45	12.23
没有工作	3.12	9.32	10.47	4.10	10.37	16.49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子女的生理、心理发育更为成熟，其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更强，有意愿且能够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而低年龄段的子女主要以接受各类教育为主，此外在父母强烈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成才期望下，除了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外，家中子女通常还参加了各类与“成才”有关的社会辅导班和兴趣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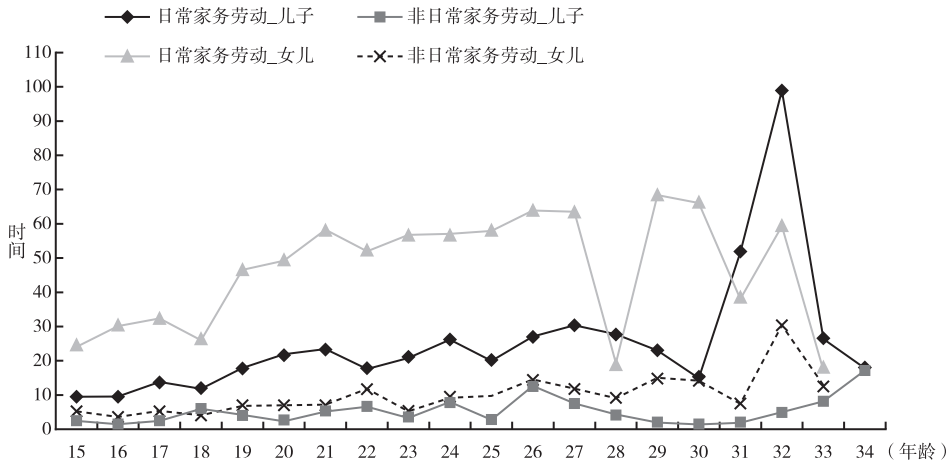


图1 15~34岁子女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学习任务异常繁重，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家务劳动。从图1不难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子女家务劳动时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相较于非日常家务劳动，日常家务劳动属于“劳动密集型”活动且发生的频率较高，年龄对子女日常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非日常家务劳动曲线则相对平缓，年龄的增长并未显著增加子女从事非日常家务劳动的时间。从整个年龄段来看，子女在家务劳动分工上一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儿在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上均多于儿子，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性别差异更为明显，尤其表现在日常家务劳动上。

### (三) 父母工作状态对其自身及子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

父母的工作状态会对自身家务劳动时间产生影响。相比于兼职或没有工作，全职工作的工作地点、时间比较固定，且时间弹性较小，从事全职工作的人往往面临着较强的时间禀赋约束，从而无法分配额外的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少。表4显示，若父母工作状态均为全职工作，时间资源约束最强，家务劳动时间最短，其家务劳动总时间为204.17分钟，其中父母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51.68分钟和152.49分钟；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不从事全职工作，意味着从事家务劳动面临的时间约束较小，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当仅有父亲或母亲从事全职工作时，父母家务劳动总时间分别为324.64分钟、281.51分钟，而当父母工作状态均非全职工作时，父母家务劳动总时间高达369.95分钟。

同时，父母的工作状态对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当父母工作状态均为全职工作时，父亲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51.68 分钟，而在只有父亲从事全职工作的情形下，其家务劳动时间减少至 45.98 分钟，母亲的家务劳动时间则由“双全职工作”情形下的 152.49 分钟增加至 278.66 分钟，是父亲家务劳动时间的 6 倍多。当父亲工作状态为非全职工作时，其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增加，若父母均不从事全职工作或只有母亲从事全职工作，父亲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 109.78 分钟和 144.37 分钟，而母亲家务劳动时间则有所减少，分别为 260.17 分钟和 137.14 分钟。可见，父母双方家务劳动具有较强的替代性，当夫妻一方由于工作时间约束无法履行家务劳动义务时，其配偶会相应地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父母工作状态对子女（尤其是儿子）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并不明显。无论父母一方或双方从事全职工作，儿子的家务劳动时间都相对稳定。女儿的表现则随父母工作状态略有变化，在父母“双全职工作”情形下，其家务劳动时间有所增加，提高至 53.82 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父母工作状态均非全职工作时，子女的家务劳动时间最长，这可能是因为在该情形下，父母面临的时间约束较小，能够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同时也引导或鼓励子女参与其中，从而提高了其家务劳动时间。

表 4 不同父母工作状态下载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时间

单位：分钟

家务劳动	父母		子女	
	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父亲全职工作、母亲全职工作				
家务劳动	51.68	152.49	21.80	53.82
日常家务劳动	41.41	131.27	17.48	44.91
非日常家务劳动	8.94	20.10	3.98	7.88
样本数	1114	1114	648	466
父亲全职工作				
家务劳动	45.98	278.66	21.14	47.12
日常家务劳动	35.50	231.76	17.72	38.69
非日常家务劳动	9.57	43.94	3.08	7.09
样本数	693	693	386	307
母亲全职工作				
家务劳动	144.37	137.14	20.32	46.11
日常家务劳动	106.17	115.30	15.56	37.91
非日常家务劳动	35.71	19.87	3.91	7.14
样本数	193	193	111	82

续表

家务劳动	父母		子女	
	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父母都不从事全职工作				
家务劳动	109.78	260.17	32.24	54.38
日常家务劳动	80.34	213.15	22.81	46.72
非日常家务劳动	26.27	45.34	9.05	6.31
样本数	430	430	233	197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子女的年龄、主要活动和父母的工作状态均会对个体的家务劳动时间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个体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家中是否有0~6岁小孩等家庭变量也是影响家务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为了全面分析父母和子女家务劳动时间差异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其家务劳动、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见表5、表6。

表5 代际家庭成员家务劳动Tobit回归的边际效应

变量	子女		父母	
	儿子	女儿	父亲	母亲
子女变量				
性别	—	—	-0.08	-3.59
在校学生	-10.44***	-46.30***	-2.32	7.59
全职工作	-11.40***	-30.53***	-2.67	10.50
兼职工作	7.08*	12.47*	-6.20	5.77
年龄(20~24)	6.56***	12.42***	2.05	-14.82***
年龄(25~34)	11.52***	14.86***	7.63**	-2.16
父母变量				
父亲				
全职工作	-7.42***	4.63	-68.41***	27.39***
兼职工作	-6.91***	7.51	-24.74***	16.30**
高等教育	1.20	-3.86	0.19	-4.09
中等教育	1.57	2.64	4.46	-6.09
母亲				
全职工作	0.42	8.41***	17.27***	-146.97***
兼职工作	-0.67	1.94	12.45***	-63.92***
高等教育	2.04	-1.44	4.57	-21.27***
中等教育	0.81	-2.45	3.41	-11.63**

续表

变量	子女		父母	
	儿子	女儿	父亲	母亲
家庭变量				
家中有无0~6岁小孩	0.42	-1.03***	-2.10	-6.01
城乡	-7.59***	-7.21**	16.70***	-0.06
东部地区	-4.51**	-9.78***	-5.21**	0.30
中部地区	-5.35***	-9.76	-9.62***	20.39***
删截样本数	669	306	504	38
未删截样本数	709	746	1926	2392
样本数	1378	1052	2430	2430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由表5、表6可知，子女的年龄和主要活动状态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影响比较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承担家务劳动的能力和意愿增强，相比于年龄较小的子女，其家务劳动时间更长。与15~19岁子女相比，20~24岁、25~34岁的女儿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分别高出12.42分钟和14.86分钟，而儿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则相应多出6.56分钟和11.52分钟。同时，子女的主要活动状态也是影响其家务劳动时间的显著变量，在校学生或从事全职工作的子女，由于时间资源禀赋相对较少，从而表现为较少的家务劳动时间。目前是在校学生或从事全职工作的儿子（女儿）比没有工作的儿子（女儿）在家务劳动上分别少投入10.44分钟（46.30分钟）、11.4分钟（30.53分钟）。子女年龄和主要活动对其日常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表现出相似的规律，即年龄越大的子女，其日常家务劳动时间越多，以在校学习或全职工作为主要活动的子女，其日常家务劳动时间较少。而对于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年龄和主要活动对儿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子女变量（除了年龄）对父母家务劳动时间影响较小，子女年龄为20~24岁的母亲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比子女年龄为15~19岁的母亲减少14.82分钟，而子女年龄为25~34岁的父亲的家务劳动时间则相应增加7.63分钟。子女年龄对父母家务劳动时间产生相反的影响效应，可能是因为：母亲是繁重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年龄较大的子女更像是其家务劳动“助手”，能够帮其分担部分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从而表现为家务劳动的减少。而对于父亲，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可能逐渐意识到其主动承担家务对子女性别意识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日后的成家立业，从而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

表6 代际家庭成员日常、非日常家务劳动 Tobit 回归的边际效应

变量	子女				父母			
	儿子		女儿		父亲		母亲	
	日常家 务劳动	非日常家 务劳动	日常家 务劳动	非日常家 务劳动	日常家 务劳动	非日常家 务劳动	日常家 务劳动	非日常家 务劳动
子女变量								
性别	—	—	—	—	0.66	-1.59	-3.74	0.13
在校学生	-6.42**	-3.07	-35.59***	-6.87***	-0.96	-1.24	3.97	4.16*
全职工作	-7.19***	-3.00	-22.29***	-5.49***	-2.01	0.03	6.90	2.63
兼职工作	6.20*	3.02	16.07**	-3.80**	-5.79	-1.00	1.89	2.49
年龄(20~24)	6.72***	1.12	10.48***	3.65***	3.41	-0.44	-10.17**	-1.89
年龄(25~34)	11.03***	4.32**	11.26***	7.10***	6.09**	1.66	-3.42	2.11
父母变量								
父亲								
全职工作	-4.06*	-2.83	3.49	2.00	-44.62***	-15.63***	27.37***	0.04
兼职工作	-5.79***	0.35	6.79	1.23	-16.54***	-3.75*	18.21***	-0.99
高等教育	0.81	1.86	-3.15	-1.58	-0.86	1.58	-4.01	0.19
中等教育	1.42	1.00	3.19	-1.15	1.91	3.34*	-6.25	0.42
母亲								
全职工作	0.74	0.33	7.39***	1.71	14.13***	2.65*	-115.22***	-19.50***
兼职工作	0.09	-1.11	2.73	0.53	9.13***	1.14	-48.50***	-7.42***
高等教育	3.49	0.24	-2.53	2.02	9.54***	-2.52	-21.59***	1.59
中等教育	2.83	-1.65	-1.11	0.20	6.88***	-1.83	-12.65***	1.23
家庭变量								
家中有无0~6岁小孩	0.04	1.92	-1.05	0.01	-0.58	-0.67	-1.31	-2.27
城乡	-5.29***	-3.15**	-3.70	-4.81***	19.41***	-0.08	-0.32	1.60
东部地区	-4.03**	-0.66	-8.34***	-0.13	-3.73*	0.29	-1.05	2.62*
中部地区	-5.00***	-1.26	-8.57***	0.52	-7.97***	-0.44	17.95***	3.27**
删截样本	767	1142	365	747	672	1563	43	708
未删截样本	611	236	687	305	1758	867	2387	1722
样本数	1378		1052		2430		243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父母的工作状态对自身及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比较明显。工作时间的长短决定了父母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禀赋，工作时间越长意味着时间资源越短缺，家务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回归结果表明，从事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的

父母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显著少于没有工作的父母。相比于没有工作的父母，从事全职和兼职工作的父亲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分别减少 68.41 分钟和 24.74 分钟，而对于从事全职和兼职工作的母亲，其家务劳动时间分别减少 146.97 分钟和 63.92 分钟。分家务劳动类型来看，无论是日常家务劳动还是非日常家务劳动，工作状态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均表现为相同的特征，即工作时间越长，其日常和非日常家务劳动时间越短。同时，父母的工作状态对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当夫妻一方由于工作时间原因而无法履行家务劳动义务时，其配偶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当母亲工作状态为全职和兼职工作时，父亲的家务劳动时间相应提高了 17.27 分钟和 12.45 分钟；类似地，当父亲工作状态为全职和兼职工作时，母亲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了 27.39 分钟和 16.30 分钟。子女家务劳动时间受父母工作状态的影响相对较小，儿子家务劳动时间主要受父亲工作状态的影响，而女儿则更多地受母亲影响，相比于没有工作的父母，全职工作父亲的儿子家务劳动时间减少 7.42 分钟，而全职工作母亲的女儿家务劳动时间则增加 8.41 分钟。

教育程度越高往往意味着越高的工资收入，根据家庭时间分配的相对资源理论，其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越大，从而在家庭内部事务（包括家务劳动分工）决策中具有相对较高的“话语权”。同时，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体的性别观念，一般而言，学历越高，性别平等观念越强，在家庭家务劳动分工中更主张“男女平等”，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由表中结果可知，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自身和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比较显著，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母亲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比仅受初等教育的母亲分别减少 21.27 分钟和 11.63 分钟；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配偶家务劳动时间则越长，当母亲的教育程度为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时，父亲的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分别显著增加了 9.54 分钟和 6.88 分钟，表明母亲的教育程度更多地影响了日常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此外，父母的教育程度及其性别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女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子女通过日常的观察和学习，逐步形成自身的家庭内性别分工观念，并在家务劳动分工中予以体现。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性别平等观念越强，在家庭事务中鼓励儿子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相比于父母教育程度均在中等教育以下的家庭，父亲（母亲）教育程度达到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将分别导致儿子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增加 1.2 分钟（2.04 分钟）和 1.57 分钟（0.81 分钟）。可见，父母的性别观念对子女家务劳动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代际传递”，但这一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从家庭变量来看，“家中有无 0~6 岁小孩”对父母和子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并



不显著,而现有研究发现家中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务劳动时间的重要变量,子女年龄越小,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可能是由于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被调查者将与照料子女相关的家务劳动(如为子女做饭、洗衣服等)时间作为CTUS活动分类中“照顾未成年家人”进行记录,从而导致这一变量在本文研究中影响并不显著。家庭所在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家务劳动可由“家庭供给”转向“市场供给”,从而减少父母及子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因此东中部地区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少。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基本国情,城市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明显优于农村,城市子女个人时间更多投入到接受各类教育和从事市场工作中,从而表现为相对较少的家务劳动时间。此外,由于农村地区父母传统性别观念较强,仍以“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为主,父亲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低于城市地区。

#### 四 研究结论与启示

家务劳动分工一直是社会和学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相对资源、时间禀赋、性别观念等视角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影响因素及机制开展研究。但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家庭中同一辈人,而对不同辈家庭成员之间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研究较少。由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原因,在中国,未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的现象较为普遍,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也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但其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有文献对子女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2008年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测算了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现状,并从子女变量、父母变量和家庭变量三个层面对父辈与子辈家务劳动时间差异进行实证分析与解释。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父辈还是子辈,其家务劳动参与率及时间均存在着统计显著的性别差异。从家务劳动性别差异来源来看,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其家务劳动性别差异主要来源于日常家务劳动,女儿对日常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明显高于儿子;在家务劳动代际分工中,母亲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其家务劳动时间是父亲的3倍多,子女对家务劳动的贡献约为10%;子女的年龄及其主要活动状态对自身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较为显著,年龄较小的子女主要以在校学生为主,其面临着繁重的校内、校外学习任务,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承担家务劳动的能力和意愿增强,从而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同时,子女家务劳动时间也受父母工作状态的影响,但却表现为完全相反的效应,父亲工作时间越长,儿子家

务劳动时间越短，而母亲工作时间越长，女儿家务劳动时间则越长。

工作状态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父母家务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根据时间禀赋理论，工作时间越长意味着较强的时间约束，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的父母家务劳动时间明显低于没有工作的父母。父母的工作状态也会影响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当夫妻一方由于工作时间原因而无法履行家务劳动责任时，其配偶将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个体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父母（尤其是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大，另一方面其持有的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男女平等”，从而主张相对公平的家务劳动分工，因此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提高，其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减少，同时父亲的日常家务劳动则明显增加。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家务劳动时间影响较小，父辈性别平等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并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较高，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少，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农村父亲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少于城市父亲。

可见，在家务劳动代际分工中，家务劳动依然是母亲的“天职”，特别是参与市场性劳动就业的女性，往往肩负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无暇通过学习、在职培训等方式提高个人业务水平和能力以实现事业上的成功，或参与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以促进个人身心健康。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资源约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居家办公已成为可能，建议率先试点实施女性弹性工作制，摆脱传统工作固定地点、固定时间的约束，使得女性能够更好地兼顾家庭和谐与事业发展，促进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要继续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贯彻和执行，积极改善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机会不平等和家庭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分工不平衡，实现妇女全面、平等参与各项经济社会活动。应充分发挥父母性别平等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鼓励子女（尤其是儿子）参与一定的家务劳动，引导其形成正确的性别观念。此外，要在大力提倡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家务劳动市场化，努力实现家务劳动主要由“家庭供给”向“市场供给”转变，减少家庭成员家务劳动（特别是日常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家庭和社会具有更大经济效能的事务中。

## 参考文献：

贺光烨、简敏仪、吴晓刚（2018），《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

- 究》，《人口研究》第3期，第79-90页。
- 刘爱玉、佟新、付伟（2015），《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社会》第2期，第109-136页。
- 齐良书（2005），《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9期，第78-90页。
- 卿石松（2017），《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第11期，第91-100页。
- 孙晓冬（2018），《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社会》第5期，第214-240页。
- 佟新、刘爱玉（2015），《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96-111页。
- 杨菊华（2014），《传统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第2期，第31-41页。
- Arrighi, Barbara & David Maume (2000). Workplace Subordination and Men's Avoidance of Housework.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 (4), 464-487.
- Artis, Julie & Eliza Pavalko (2003).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Women's Household Labor: Individual Change and Cohort Differenc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 (3), 746-761.
- Bianchi, Suzanne & Melissa Milkie (2010). Work and Family Researc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 (3), 705-725.
- Bianchi, Suzanne, Melissa Milkie, Liana Sayer & John Robinson (2000).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Social Forces*, 79 (1), 191-228.
- Ciabattari, Teresa (2004). Cohabitation and Housework: The Effects of Marit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1), 118-125.
- Claffey, Sharon & Kristin Mickelson (2009).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Distress: The Role of Perceived Fairness for Employed Mothers. *Sex Roles*, 60, 819-831.
- Coltrane, Scott (2000). Research on Household Labor: Modeling and Measuring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Routine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 (4), 1208-1233.
- Craig, Lyn, Abigail Powell & Judith Brown (2015). Co-resident Parents and Young People

- Aged 15 – 34: Who Does What Housework?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121, 569 – 588.
- Cunningham, Mick (2007). Influences of Women's Employment on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over the Life Course: Evidence from a 31 – Year Panel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 (3), 422 – 444.
- Davis, Shannon, Theodore Greenstein & Jennifer Marks (2007). Effects of Union Type on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Do Cohabiting Men Really Perform More Housework?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 (9), 1246 – 1272.
- Evertsson, Marie (2006). The Reproduction of Gender: Housework and Attitudes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the Home among Swedish Boys and Girl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7 (3), 415 – 436.
- Fuwa, Makiko (2004). Macro-Level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22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6), 751 – 767.
- Fuwa, Makiko & Philip Cohen (2007). Housework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6 (2), 512 – 530.
- Gershuny, Jonathan & Oriel Sullivan (2003). Time Use, Gender, and Public Policy Regimes. *Social Politics*, 10 (2), 205 – 228.
- Greenstein, Theodore (2009). National Context,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Fairness in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4), 1039 – 1051.
- Hook, Jennifer (2006). Care in Context: Men's Unpaid Work in 20 Countries, 1965 – 2003.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4), 639 – 660.
- Knudsen, Knud & Kari Wærness (2008). National Context and Spouses' Housework in 34 Countr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1), 97 – 113.
- Kroska, Amy (2004). Divisions of Domestic Work: Revising and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 (7), 890 – 922.
- Lincoln, Anne (2008). Gender, Productivity, and the Marital Wage Premium.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 (3), 806 – 814.
- Mannino, Clelia & Francine Deutsch (2007). Changing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 Negotiated Process Between Partners. *Sex Roles*, 56, 309 – 324.
- Miller, Pavla (2012). Do Australian Teenagers Work? Why We Should Care. *Feminist Economics*, 18 (4), 1 – 24.
- Mitchell, Barbara (2004). Home, but Not Alone: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 Canadian Young Adults Sharing Parental Households. *Atlantis*, 28 (2), 115 – 125.
- Noonan, Mary, Sarah Estes & Jennifer Glass (2007). Do Workplace Flexibility Policies Influence Time Spent in Domestic Labor?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 (2), 263 – 288.
- Parkman, Allen (2004). Bargaining over Housework: The Frustrating Situation of Secondary Wage Earne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3 (4), 765 – 794.
- Pinto, Katy & Scott Coltrane (2009). Divisions of Labor in Mexican Origin and Anglo Families: Structure and Culture. *Sex Roles*, 60, 482 – 495.
- Poeschl, Gabrielle (2008). Social Norms and the Feeling of Justice about Unequal Family Practic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1, 69 – 85.
- Robinson, Bryan & Enrica Hunter (2008). Is Mom Still Doing It All? Reexamining Depictions of Family Work in Popular Advertis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9 (4), 465 – 486.

##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TUS**

Han Zhong & Wang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Time Use Survey (CTU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its work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housework time between both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with mothers finish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housework. Age and working status determine children's housework time, with children as student or working full-time doing least housework. Parents' employment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ousework hours of the spouses; the longer of working hours of one spouse, the more housework done by the other. Parents who hold egalitarian gender attitude share housework more equally. However, there is no enough evid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galitarian gender attitude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Keywords:** housework,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time use, gender attitude

**JEL Classification:** J10, J12, J22

(责任编辑: 合羽)